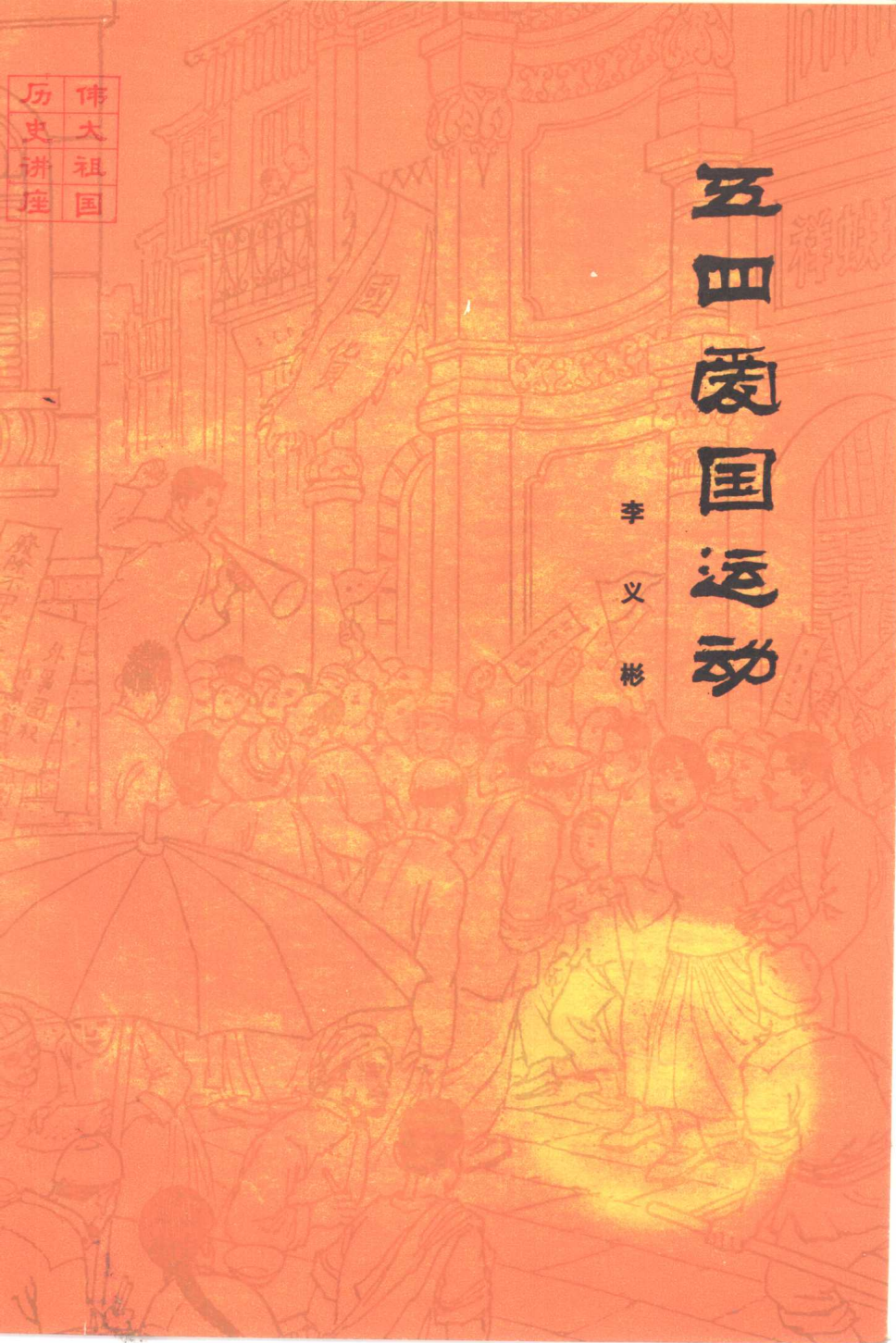


历史
讲座

伟大祖国

五四爱国运动

李
义
彬



“伟大祖国”历史讲座

五四爱国运动

李义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北京

五四爱国运动

李义彬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南宫县印刷厂排版

涿县辛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 1/32开本 1 $\frac{5}{16}$ 印张 21千字

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198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600册

统一书号: 11201 24 定价: 0.25元

编 者 的 话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创造了著称于世的灿烂文化；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出现过无数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产生过很多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

近百年来，我们的祖国曾经遭受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和疯狂的侵略掠夺。酷爱自由和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学习祖国的历史，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为此，北京图书馆、北京市历史学会、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伟大祖国”历史讲座，并编辑了这套丛书。这套丛书将以单行本的形式陆续出版。每本书末附有北京图书馆馆藏有关参考书选目，便于读者参阅。

编者

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运动，即新文化运动。今天集中讲讲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开始，到六月二十八日中国专使拒签巴黎和约为止，近两个月时间。运动的时间虽不是很长，但运动的规模很大。运动在北京爆发后，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参加运动的阶层也极为广泛，可以说除了亲日派、卖国贼外，大部分人都卷入到运动中来。运动的主力，“六三”是青年学生；“六三”后是工人。

下面分五个问题讲。

（一）五四爱国运动的背景

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有深刻的社会根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趋严重。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日甚一日，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就是在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深化的基础上发生的。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在国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阴谋推翻共和，复辟帝制。他为了换取帝国主义支持，不惜大肆拍卖国家主权。

当时，对中国民族生存威胁最大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它乘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它加紧侵略中国的第一步是出兵侵占山东。在这之前，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借口曹州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在曹州府巨野县被大刀会杀死），派军舰侵占了胶州湾。翌年三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胶奥租借条约》。依此条约，中国将山东胶州湾地方借与德国九十九年；准德国在山东建造胶济铁路；铁路附近各三十华里的矿产德国人可以开采。一九一四年七月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之间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战争双方一是奥、匈、德等“同盟国”，一是英、法、俄等“协约国”。日本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宣战后，即派兵二万多人从山东龙口登陆，很快打败了德兵，控制了胶州湾一带。至此，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完全被日本所取代。日本并不以侵占山东为满足，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它便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全中国的“廿一条”。“廿一条”分为五号：第一号是有关山东问题，日本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它继承原来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

并要求取得许多新的权利，如要求“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以及“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等。第二号，要求享有独霸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权利。第三号，要求享有独霸汉冶萍公司及其附近矿产的权利。第四号，要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他国”。第五号，要求享有操纵中国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机关的权利，并把福建、江西、广东等省，事实上划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袁世凯意识到，签订这样一个极为苛刻的条约，不仅会遭到国内人民的反抗，也会遭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所以在开始谈判时袁迟疑不决，并一再要求日本让步。在谈判过程中，日方代表、驻华公使日置益堕马跌伤，中方代表曹汝霖等竟丧失起码的外交礼仪，到日置益的床前继续谈判，被讥为“床前外交”。日本政府对袁世凯的拖延态度很不满，五月七日向袁世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声言：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和第五号中的福建问题，限中国政府至迟在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以前作出满意答复，否则日本将采取“必要之手段”。称帝心切的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命令外交总长陆征祥五月九日在“廿一条”上签字。从此，中国人民就把五月七日（或五月九日）作为国耻纪念日。直接办理“廿一条”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

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輿，成为人们最痛恨的卖国贼。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决定实行帝制，并把一九一六年改为洪宪元年。可是不到半年，他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了。袁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掌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皖系军阀头子）手里。段和黎之间有矛盾，一九一七年初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发生了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亲日派段祺瑞遵照其主子的意旨决定对德宣战，可是反映美国利益的黎元洪则拒绝在段祺瑞的对德绝交电稿上签字。府院之争导致了张勋复辟丑剧（安徽督军张勋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拥清废帝溥仪在北京称帝复辟）的上演。段祺瑞先是支持张勋复辟；而当张行将败亡时，他又在马厂誓师讨张，充当“再造民国”的功臣。段祺瑞获得胜利，黎元洪被迫下台，直系军阀头子冯国璋继任总统，但大权仍攥在段祺瑞手中。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宣布对德作战，中国成为“协约国”一员。中国参战后，山东权益非但没有收回，反而进一步丧失了。段祺瑞为了消灭异己打内战，大肆拍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借债。一九一七年九月，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后藤换文就是其中的突出一例。原来，德国在山东除了经营胶济铁路外，还从袁世凯政府那里取得了修筑延长线的权利，即从济南到顺德，从高密至徐州。中日“廿一条”谈

判时，对此曾有所涉及，但未在条约中作具体规定。中国参战后，日本要求用条约的形式肯定下来；而段祺瑞为了扩充实力，也想从日本那里获得一笔借款。于是中日双方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签订了济顺、高徐铁路借款二千万日元的合同。由于这项借款涉及到山东问题，事前日本外相后藤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在济南、青岛驻兵，以及在经营和管理胶济路方面享有种种特权。章宗祥立即复照，“欣然同意”日本的全部要求。这份“欣然同意”的换文，后来成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拒不退还山东的借口。

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中间，俄国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纪元，推动了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是和十月革命及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分不开的。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干涉十月革命，同时也为了扩大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一九一八年五月与中国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利用此协定，向长春以北的中东铁路附近地区调去了六万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片领土。

为了反抗这一协定，几千名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归国。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等都是这时从日本回国

的。归国学生在上海成立了学生救亡团体总部，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分部。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校两千多名学生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宣布并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这次请愿虽由于学生受骗而宣告失败，但可以看成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争的结果是“同盟国”失败，“协约国”获胜。消息传来，中国人民欢欣鼓舞，北京各学校放假三天，举行了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象征中国人民屈辱的、矗立在东单北侧的克林德碑被拆除，移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建成了“公理战胜”牌坊。这时，中国人民由于受了美国总统威尔逊鼓吹的“和平条款十四条”的影响，认为欧战的结束是“公理战胜强权”，今后国家不论大小，都可同享平等权利了。所以，北京学界举行提灯游行时，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称颂威尔逊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但是，事实很快打破了中国人民的幻想。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一千多名代表。实际操纵会议的是美、英、法、意、日五个国家，特别是美、英、法三国。中国作为战胜国出席了会议，代表有陆征祥（外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祖

（驻比公使）和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廿一条”等提案，均被拒绝讨论。会议在讨论山东问题时，尽管中国代表反复陈述了应将胶州湾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理由，可是日本代表却以章宗祥的“欣然同意”换文和一九一七年初英、法、俄、意曾与日本达成的秘密谅解（它们允许日本占据山东）为词，拒不交出山东。会议最后满足了日本代表的要求，并将它写入对德和约草案。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成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

（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巴黎传来的噩耗，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破除了依靠外力（特别是美国）收回山东权益的幻想。陈独秀这时说：“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北大学生则讥讽地说：威尔逊发明了一条数学公式：十四等于零。

在中国最早刊登巴黎和会上中国失败消息的是上海出版的英文版《大陆报》（5月1日）；但影响最大的还是5月2日北京《晨报》上发表的林长民写的《外交警告，警告国人》一文，其中写到“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该文虽无详细说明，但作者是大总统徐世昌的

顾问，又是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所以大家看了都深信不疑。同一天，北大学生、《国民》杂志社成员许德珩也从蔡元培口中得到了这一消息。下午他们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开会讨论对付办法。大家决定5月3日晚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开学生大会，邀请其他专科以上学校派代表参加。五月三日晚，北大法科礼堂挤得满满的，共有一千多人参加。北大学生和校外学生纷纷发言，情绪激愤，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断衣襟，写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表达了学生们的决心。会议决定：①联合各界，一致力争；②通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③通电全国，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示威游行；④五月四日（星期日）学界集合在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为了筹集活动经费，学生当场捐献，纷纷把银元、钞票、手表、戒指扔到台上去。会议结束时已近午夜，但学生们没有休息，紧张进行准备，有的写宣言、传单，有的制作旗帜。除北大外，其他学校也都在准备。在北京高师（北师大前身），工学会成员在秘密开会，事先他们设法弄到了卖国贼曹、章、陆的照片，并决定带上汽油和火柴，准备游行时采取暴烈行动。有的学生已作了牺牲的准备，对自己的后事作了安排。

五月四日下午二时，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名学生陆续到天安门广场集合。北大是这次活动的发起者，但

他们到的最晚，因为他们在沙滩红楼操场集合时，北京政府教育部曾派人前来劝阻，经邓中夏、黄日葵等拒理驳斥，冲破阻拦后才出发的。学生们手中拿的旗帜，上面写着“还我青岛”、“誓死力争”、“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标语，北大学生谢绍敏写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在会场上，很激动人心。学生们到齐后，散发了传单，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军统领李长泰赶到，劝阻学生不要游行。学生没有理睬他们，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南行出中华门，当走到东交民巷路口时被阻，无奈派代表到美使馆递交“陈词”。得到的答复是大使不在。学生在“陈词”中希望美国政府主持正义，帮助中国收回山东权益。这说明当时学生对美国还抱有幻想，还不懂得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一丘之貉的道理。学生代表又去英、法使馆，不仅没见到大使，连所递的信件也未被接收。想去日本使馆，却又被卫兵阻止了。中国还没有亡，怎么就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通行？这样更增加了学生们对卖国贼的痛恨，于是决定去赵家楼找曹汝霖算帐。游行队伍总指挥傅斯年怕惹起事端，极力劝阻，但毫无效果。学生游行队伍一面高呼口号，一面散发传单，经富贵街、东长安街，到达东单，再往北折，经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大羊宜宾胡同，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这时已是下午四时半了。

这天中午，徐世昌在总统府宴请刚刚回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邀曹汝霖作陪。在宴会进行中，他们得知学生游行的消息，有人建议曹汝霖暂别回家。曹汝霖根本无视学生的力量，认为派军警一恐吓就没事了。曹汝霖和章宗祥大摇大摆地返回了曹宅。学生见曹宅门前有警察把守，无法入内，便把手中的小旗抛进院内，并连声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几个学生爬上围墙上的窗洞，砸破铁窗进入院中，把大门打开，大批学生涌进曹宅。学生先到前厅，见空无一人，一怒之下，将家俱打坏。再通过花园进入内厅，章宗祥和一名日本记者正在这里，学生遂将章痛打了一顿，后在日人保护下送往同仁医院。曹汝霖则躲在一间小屋里未被学生发现。学生找不到曹汝霖，非常气愤，于是在屋内点了一把火。火起后半个小时，军警赶到，把没来得及走掉的三十二名学生逮捕，把曹全家送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学生用如此强烈的手段来反抗反动派，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所以反动派极为害怕。五月四日晚间，在国务总理钱能训家中召开内阁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学生的办法。反动派内部意见不尽一致。执政的皖系军阀主张严惩学生，段芝贵竟说“宁可十年不要学校，不可一日容此学风”。有的官僚甚至主张把参加游行的学校一律解散；总统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则主张采取怀柔政策，怕事态扩大。与此同时，学

生也在开会。蔡元培参加了北大学生们的会议。他说他负责营救被捕学生，劝学生不要罢课。学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决定联络各校罢课。当场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从五月五日起，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罢课。学生要求北京政府直电巴黎和会，不承认“廿一条”，不在和约上签字，立即免掉卖国贼曹、章、陆的职务。五月五日下午，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各校学生联合大会，有三千人参加。在会上报告了上午各校代表开会的情况。警官学校一名学生当场血书“杀卖国贼”四个大字。地处西郊的清华学校派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决定和全市学生一致行动，从当日起开始罢课。

为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北京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评议部由每校派二名代表组成，负责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干事部负责办理评议部决定的事项，委托北大学生干事会代理。地点设在马神庙（今景山东街）北大二院内。

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积极参加营救被捕的学生。他们去教育部、警察厅，没有结果；去国务院、总府，又被拒绝接见。

北京的消息一传出，立刻震惊了全国。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纷纷集会和致电北京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五月七日即将来临，按原来计划，这一天

全国各地都要开国民大会。北京政府怕学生在“五七”再次集会游行，不得不考虑释放被捕学生了。六日晚，警察总监吴炳湘向蔡元培提出了释放学生的两个条件：一是明日不许学生参加国民大会；二是明日各校学生一律上课。蔡答应了上述条件。五月七日各校学生开始上课，被捕学生获释返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学生刚刚获释，蔡元培又被迫辞职出走。蔡到北大后，就大力改革这所封建学府，提倡和保护新思潮，聘请具有进步思想和真才实学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来校任教，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广大师生爱戴他，反动派忌恨他。现在，他又同情学生的爱国运动，积极营救被捕的学生，反动派则把他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实际上已决定派人接替他的北大校长职务。在反动派的重重压力下，五月九日蔡元培留下一张辞职书，悄然离京出走，经天津、南京、上海，到杭州暂住。蔡被逼出走，激怒了广大学生，掀起了一场挽留蔡元培的斗争。挽留蔡元培，不单单是蔡个人的去留问题，它关系到分清是非和功罪的问题，即正义是在广大学生和蔡元培一边，罪过是在反动政府一边。是非不容混淆，功罪不能颠倒！在挽留蔡的斗争中，广大教职员也发动起来了，成立了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在广大师生的共同斗争下，北京政府被迫于五月十四日下令挽留蔡元培。

五月十四日，北京政府在下令挽留蔡元培的同时，下令挽留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輿，并下令恐吓和镇压爱国的青年学生。对学生表同情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被下令免职，决定让安福系政客当教育总长，让一个卖身投靠、与卖国贼串通一气（五四事件后急忙赶去慰问曹、章）的人接办北大。所有这些，充分暴露了北京政府的反动本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经多次讨论，决定从五月十九日起实行总罢课。五月十八日举行了郭钦光追悼会，为总罢课作了动员。郭钦光是北大学生，患有肺病。“五四”那天，他不顾同学劝阻，执意参加了示威游行。目睹了反动政府逮捕爱国青年，使他气愤异常，口中吐血。虽经医院抢救，也未好转，于五月七日逝世。追悼会场上挂满了各界送来的三千幅挽联，有的写着“力争青岛，死重泰山”。大会在极端悲愤的气氛中进行，当最后一位演说的妇女声泪俱下时，全场痛哭起来。五月十九日起，总罢课实现。北京各校二万五千多名学生参加罢课，他们向北京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其中主要的是：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挽留蔡元培、傅增湘等。在罢课期间，学生们开展了下列各项爱国活动：

1、组织十人团，开展讲演活动。“五四”后各校学生就开始讲演。十九日后参加讲演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讲演的题目有“青岛问题”、“国民自